

芳林公园回潮？

黄伟曼

联合早报，2013年4月14日

反人口白皮书和平集会只是新加坡人的政治昙花一现，还是预示政治风潮回涨，芳林公园聚集社会能量的功能已经复活？

作为政党群众大会、学运、工运以及社会活动的聚焦中心和能量出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芳林公园见证了新加坡历史最原始的政治风潮和社会觉醒；风起云涌的岁月酿造的慷慨激昂，始终都在。历史场景之一的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立法议会选举提名日后，人民行动党在芳林公园举行首个群众大会，时任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站在临时搭建的露天讲台上，以铿锵有力的演说，激起台下3万多名民众的热情回应；黑压压的人群，千千万万张无法清楚辨识的脸庞，呼唤独立的“默迪卡”呐喊直截了当，雄浑强烈……

如果说那个年代是新加坡人民政治觉醒的时刻，当时的芳林公园便是政治舞台的符号，象征了群众力量和自由意志。新加坡独立以后，在反对党势力逐渐衰落，人民行动党强势执政的大背景下，芳林公园沉寂了；

一些社会观察家认为，这说明“新加坡经历了一段‘去政治化’的过程”。

2000年9月，政府在芳林公园辟设“演说角落”以顺应社会开放的诉求，尝试借鉴英国海德公园演说角落的模式，让新加坡人透过针砭时局，去除生活怨气。

匆匆13年过去了，“演说角落”只偶有零星“骚动”，绝大多数时候处于喑哑状态的芳林公园直到今年2月中才重新释放、展现政治热情：几千名新加坡人冒雨聚集，参与反人口白皮书和平集会。

媒体以及互联网上对这个集会的报道与传述，让“演说角落”获得自设立以来最大的关注；

陈有利：演说角落不再只是象征

数名学者与关注“演说角落”发展的公民社会活跃人士受访时指出，随着新加坡政治环境与社会出现变化，“演说角落”这个公共空间已超越最初的象征意义，有了实际的角色。

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陈有利博士受访时说，政府当年虽同意设立“演说角落”，但开始时仍存有许多疑虑。

1999年，民间团体“圆桌论坛”（The Roundtable）与其他群体吁请政府效仿他国，

开辟自由言论角落，让人们在不必申请准证的情况下畅所欲言。陈有利当时是圆桌论坛一分子。

他透露，“圆桌论坛”当年其实建议政府在全岛设立多个“自由演说角落”（free speech corners），不过政府没完全采纳建议。他说：“我想，政府当时认为只要将自由言论限制在一个空间里，就能防止太多人到那里演说或抗议。”

而事实上，近几年一些在“演说角落”举行的活动相当成功，让陈有利对“演说角落”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

他说：“政府早年设立演说角落时，人们不太确定应如何使用。这有点像组屋底层的空间概念，它一直存在，但人们得过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怎么用它，然后慢慢适应。当初，我们没料到芳林公园会成为人们举行烛光悼念会或反人口白皮书示威的地点，

但 现在我们看到民众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这 一个空间，为它注入全新的意义。”

陈有利指出，要了解“演说角落”的演 变，就得先厘清公共空间的概念。他 说：“我一向都跟公民社会人士说，如果政 府给你一些空间，哪怕是多么小或多么偏远 的空间，你都要紧紧抓住。最重要的是这空 间存在。”

庄庆山：新加坡人认真看待演说角落

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庄庆山博士同 意陈有利这个看法。他认为，政府辟设“演 说角落”，仅是允许人民自由发言与集合的 一种姿态，但因人民没放弃使用，这空间 如 今被赋予新的意义。

他将“演说角落”形容为“一个经过修 饰、较孤立的花园”，“但新加坡人非常认真 看待政府的举动。他们认为，既然政府给了 空间，那就好好利用吧。”

许林珠：演说角落反映新加坡政治发展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 士指出，“演说角落”的演变与新加坡的政治 发展有关联。她说：“演说角落一开始有许 多限制，现在却越来越多人使用。这就像 新 加坡政治的发展，不能够要求一蹴而就，而 是要一步一步来。新概念要待人民尝 试后， 限制才会慢慢放宽或消除。”

政府设演说角落时，除了限定演讲者谈 论的内容不涉及会引起宗教和种族冲突的敏 感课题，演说时间和登记程序方面也有所规 定。

许林珠认为，政府在 2008 年放宽限 制，允许组织示威的举动，对芳林公园来说 是项 重要的改革。

互联网与演说角落相辅相成

在这个网上讨论谁也挡不住的时代，受访学 者与公民社会活跃人士认为，“演说角落” 不 但不会沦为可有可无的“二等空间”，且能发 挥积极作用，与互联网及社交媒体 网络相辅 相成。

有学者认为，2月17日的反人口白皮书 集会能吸引近5000人出席，互联网的普及 扮 演了关键角色。

演说角落展现出集体行动

关注新媒体发展的新加坡政策研究员孙 婉婷博士指出，互联网不但传播活动信息， 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参照”（social referenc ing）效应，让有意参与集会者知 道 “有多少人会参加，哪些人参加”。

她也认为，网络与非网络有互补空间， 即使有了互联网这个表达的管道，非网络平 台仍有存在的必要。她说：“人们使用‘演 说 角落’时，展现的是一种集体行动，这 是互 联网平台无法充分表现的。”

跨媒体工作者杨君伟则认为，互联网毕竟是虚幻的空间，人们在网上发表的看法容易引起别人疑心与不安。他说：“一个人可通过网络平台，轻而易举地用鼠标按个‘赞’，但当他以实际行动出现在芳林公园时，那就具有一定的意义。”

2010年5月，一群关心母语教育的文化界人士在“演说角落”举行挺母语签名活动。参与这个活动的杨君伟指出，当时他与其他活动发起人发现，网上针对“母语在小六会考中的比重应否降低”的讨论“不够具体”，因此决定“用力量和数量取代声量”，将讨论带到芳林公园这个实体空间进行。

政治气候改变 人民敢于表态

有学者指出，除了网络效应之外，近几年本地政治环境的转变及人们对人口课题的不满，推动了反白皮书集会的举行。庄庆山指出，活动吸引上千人参与，证明人民情绪高涨，新加坡人已不怕出现在芳林公园，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公民社会活跃人士尼詹·依士迈（Nizam Ismail）则指出，反白皮书集会的成功将进一步消除人们心里的恐惧。他说：“反对人口白皮书未必要集会示威，但人们为何还踊跃出席？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团结的表现，集体参与展现的正是一种力量。”

演说角落应进行高素质对话？

空间变大之后，学者认为，人们对于“演说角落”概念和角色的认识产生变化。例如，一些人认为，演讲者站在“肥皂箱子”上随性演说，不比精心策划的“群众大会”来得吸引人。至于“演说角落”言论是否应该达到一定的标准，受访者意见分歧。

许林珠认为，人们应在“演说角落”进行“高素质的对话”。她说：“对于任何公共对话，我们应要求有一定的水平，即使是芳林公园也如此。我不是说大家都要有这样要求，但我希望对话内容能更充实，至少得符合事实且负责任。”

吴家和希望政府增设演说角落

然而，也有人认为对话大可在国会、主流媒体，或网上论坛上的平台上进行，“演说角落”应是“一个示威的场所，一个表达的空间”。反白皮书集会主办者吴家和说：“我觉得芳林公园比较适合人民宣泄不满，体现人民的力量，不一定要进行双向方向的对话。”

吴家和根据自己主办反白皮书集会的经验指出，多数新加坡人不愿触犯法律，因此仍注重示威空间的合法性。他说：“人们肯出现在芳林公园是因为这是政府批准的空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正式且和平示威的地方。”因此，他希望政府多设立几个“演说角落”。

言论自由 VS 演说角落

展望“演说角落”的未来，或有必要从更宏观角度看新加坡公民社会的发展。庄庆山认为，人们不应接受言论与异议局限在“演说角落”的概念。

他说：“如果你认为言论与异议应局限于一个角落，那就得接受自由言论只能发生在芳林公园。但如果你相信一个人应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必去芳林公园就能这样做，你的想法就得更具前瞻性。当你发现不需要到芳林公园就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进行集会，或抗议时，芳林公园就不再重要。”

演说角落见证公民社会成长

这些年来，不同群体带着不同的诉求在芳林公园“演说角落”出现，一些课题更引起共鸣，吸引不少人“捧场支持”。有受访者甚至形容，人们“无冤不到芳林公园”。从民生色彩较浓厚的话题，到更高层次的政治和社会课题，“演说角落”成为呈现不同社会关注点的舞台，也见证了公民社会力量的成长。